

第參章 中共大國外交的運用

第一節 政治上的運用

一、轉變大國形象與外交對象

國際情勢和國內環境的變化下，中共不斷的修正與外界的交流，以 1980 年為分界，明顯看出「和平與發展」的前提，是與毛澤東時期極大的不同，這也顯示中共不斷的修正自己在國際間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角色該有的作法。¹

在前蘇聯時期的「一邊倒」、「革命外交」、反蘇「統一戰線」、「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並且在前蘇聯瓦解後，因為體認到自己可能取代蘇聯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所認為的「中國威脅」，所以想盡一切辦法拉抬經濟，加速軍事現代化，在國際上與各國建立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主張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逐漸建構出「多極體」的世界格局²。除了可以藉此將中共地理、資源大國的身份轉化成政治、經濟、軍事的大國，更能穩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並經由政治的方式，使對周邊各地區獨立的活動，使各國僅成為中共國內內政，排除他國干涉³，這將有利於鞏固政權，以及國家利益與黨政利益的結合。

1997 年 9 月 13 日文匯報報導：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指出各種區域性、國際性的合作組織空前活躍。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實力不斷的增強，多極化趨勢發展將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在 1998 年 7 月中共國務院發表的「中國的國防」內容指出「各種夥伴關係朝向機制化發展，而各國獨立自主、聯合自強、協調發展的意識正在加強。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實力增強，成為國際關係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多極化趨勢和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加深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制約，並有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維護世界和平的因素不斷增長。」⁴這樣的文章顯示出中共極希望能成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極。雖然在綜合國力的評估中，美國仍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而在軍事上美國和前蘇聯仍擁有最多的核武數量。但在政治與經濟上，美國已經不是一枝獨秀

¹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頁 45。

²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53。

³ 黃仁偉，「試論中國在世紀之交國際環境中的深層次矛盾」，《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7 年第 1 期，頁 10。「防止中共成爲一個真正的世界級強權，西方的反中共勢力企圖運用『預防性遏止』戰略，從政治、經濟軍事以及文化各方面來削弱中共的力量」。

⁴ 「中國的國防」，人民日報，1998 年 7 月 28 日，版 1。

的國家，許多的國家包括英、法等歐洲國家組成的歐盟、日本、俄羅斯以及逐漸崛起的中國儼然成為世界上政經實力不容小覷的大國。

1980 年代中共認為世界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而干擾和平的就是霸權主義，因此主張反霸，而發展的問題則是在於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所以在中共展現聯合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⁵。外交事實上是內政的延續，因此維持世界和平的前提就是要先使國內能夠積極發展經濟建設以獲穩定。但是必須採取和平共處的原則，才能在與美國往來的同時，又能切割於政治之外。

二、以獨立自主的外交面對意識與現實的矛盾

為延續著 1980 年的外交政策，中共於 1982 年採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內涵是強調和平共處，但是不和任何一個超強國家結盟⁶。但務實的中共在後冷戰時期面對美蘇等大國時，採取的是三角戰略。中共周旋在美、蘇兩大陣營間，在認知上美國處於敵對的時，會與前蘇聯維持較友好的關係，甚至反映在出訪及交流上的增加。但是當中共覺得美國不是他的主要敵人時，對美國的友好態度就很明顯。或許是經濟上的利益影響到中共的外交政策。所以，中共希望藉由外交的所獲得的成果，來增加國內的政治穩定度。

在 1986 年 3 月第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中，趙紫陽提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並指出了十個基本原則與方針：

1. 反霸、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與促進共同繁榮是中國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
2. 世界各國一律平等，國際事務由各國協商解決，中國決不稱霸，也反對任何霸權。
3. 堅定獨立自主，一切國際問題依其本身的是非價值決定中國的態度。
4. 中國絕不依附任何一個超級強國，不與任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
5. 中國將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發展對外關係。
6. 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國家，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是中共對外工作的一個基本立足

5 鄧小平，「維護世界和平，搞好國內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56。

6 韓念龍，「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337-340。

點，中共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

7. 中國反對軍備競賽。

8. 中國堅持長期實施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擴大與各國的經濟、貿易、技術交流與合作。

9. 中國支持聯合國依據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

10. 中國重視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鼓勵民間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⁷

這部份顯示出鄧小平時期的外交架構。直到今天中共外交的部份政策仍是依循這十項原則。

雖然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中共陸續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總書記趙紫陽也因此而下台，原來預定將蓬勃發展的改革開放也因而遲緩下來。於是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廿八字戰略方針⁸，採取低調但不變的基本政策，以因應以美國為首的制裁行動。鄧小平更明確表示，對外政策還是兩個主要方向，首先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⁹ 中共領導人儘管在國內政治變動下，並未對國際間的政策有所變動，而且未曾採取結構現實主義中攻擊性的現實主義。主要是以防禦性的現實主義來面對國家利益的預期或是以明顯的遭受損害。採取理性而穩定的政策，是為了國內的政治穩定，寧可將經濟改革的腳步放慢。但是，中共在反霸權主義的說法上，為了讓自己在第三世界及開發中國家所處的第二世界，以政策與宣言的方式強化「反對強權政治」的認同。這樣是對國際宣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本身的經濟實力制裁中共。

在這些政治做法上，中共宣示外交政策，都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突顯這些國家在譴責中共侵犯人權的部分，就是在「干涉內政」。從獨立自主外交到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處五原則代表著一種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可能。基本上這種思維，正是鄧小平的思想政策方針，並且能維持社會主義的道德色彩。為專注於國家利益的取

7 趙紫陽，「關於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中共年報 1987**（台北：軍情局，1987 年 3 月），頁 6-77。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527。

得，於是犧牲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雖然尚未形成大國外交的具體政策，但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本質，鄧小平時期的外交政策具有彈性與現實主義色彩。

三、政策目標角色的建立與政治運用

描述大國外交的形成，必須對毛澤東至鄧小平時期的外交政策加以分析。長達五十年的三角戰略關係的過程中，中共持續轉化自己的角色，在美蘇兩大強國中取得平衡。中共不遺餘力的將自己的外交方向依國際關係加以修正，並均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毛澤東為了取得政權的穩定，選擇投入共產主義陣營，卻又為了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而與前蘇聯逐步的疏離。這段時期中共抱持著純正的共產主義，雖難與前蘇聯這樣的軍事大國抗衡，卻自詡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以正統的態勢，搖擺於美蘇之間，以取得更大的國家利益。

相較於過去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真正的不結盟」的政策方向代表的是使自己在美蘇兩大超強國之間，成為一個樞紐，雖然不至於牽制美蘇兩國，但不結盟的方式，卻使美蘇兩國極力拉攏，讓中共能開始享有左右逢源的成果，在毛澤東期間的外交政策上，是一個難得的突破。原先強調的不結盟政策，現在卻與世界各大國建立「戰略協助夥伴關係」，這樣的矛盾存在，在中共官方而言，夥伴關係不等同於戰略關係。錢其琛也在莫斯科主持的記者會中強調，新的夥伴關係不是對抗、也不是結盟，而是建立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這樣的設定和原來強調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十原則已有不同。

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下，中共在國際社會中扮演著和平倡議者、經濟發展者、第三世界權益維護者、霸權反對者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維護者。¹⁰

在和平倡議者與經濟發展者的角色扮演上，主要是實踐了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的理論，也是為了因應現實的需要。中共扮演著和平的愛好者來穩定國際間的和平局勢，並藉此來讓國內的經濟平穩的發展，以達到現代化的目的。

9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頁 353。

10 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頁 69。

就第三世界權益者而言，中共經常以文宣來強調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國家，並且為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國際間的平等地位。但是，中共為了國家的利益逐漸降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實質來往。儘管如此，中共仍是第三世界權益者的角色，只是為了提升國際地位，經常在與第三世界國家交往的同時做出隊於自己較有利的政策。

霸權反對者的角色是為了反對國際間對中共內政的干涉以及制裁。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共遭受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制裁。使中共有理由對他國宣揚：因為受到強權主義的干涉，所以反對霸權以及強權主義，以博取未參與經濟制裁國家的認同。在這個時期，中共明顯增加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交往，例如 1989 年間中共與已開發國家(含美國)的締約數僅 6 件，與共黨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締約數共 107 件，截至 1991 年止針對已開發國家的締約數才增至 17 件，與共黨等國家締約數仍維持在 107 件¹¹。這個數據印證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的確減少了與西方等經濟大國的往來。但以同一時期的經濟貿易總額來看，1989 年中共對已開發國家的貿易比重佔 47.93%，對共黨國家佔了 9.50%，對第三世界國家佔了 12.53%，到了 1990 年對已開發國家佔 41.77%，對共黨國家佔 6.41%，對第三世界國家佔了 13.62%。這些數字顯示出中共確實受到已開發國家(含美國)的經濟制裁，比例雖是明顯的降低了 6.16%，但是對於第三世界僅增加了 1.09%，對共黨國家反而減少了 3.09%。這也證實了中共對於第三世界以及原共黨的國家的交往，宣示意味多於經濟行動。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維護者一直是中共不變的立場，也是中共建政合法性的依據。在蘇聯及東歐的共黨國家持續倒台與崩潰之際，中共更必須強化共黨意識的強化，鞏固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合法性，避免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崩潰。

四、建構大國外交取向服務國家利益與政治需求

中共的外交政策，具有強烈的現實需求，而因應國際局勢、國內因素而有所修正，乃至背離當初的原則，促使人們感到中共外交政策的反覆，但這都是在中共面對國際情勢必須的權宜之計。在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面臨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峙局面，

為了當時的國家利益，選擇傾向蘇聯，以共產主義的理想治國，甚至排斥赫魯雪夫的修正主義。後來卻為了國內經濟與政治的危機，轉向西方等資本主義大國，尋求外援、爭取成為世界第一強。只要其核心價值仍能維持，在意識上就能確保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政權也能夠穩定、領土亦能夠維護、並確保國家主權的完整。

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的維護，就是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尤其是歷經「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更強調「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簡言之，中共的一黨獨大的政體，需藉由國家安全維護政權的穩定。尤其在蘇聯解體後，共黨政權的統治更是中共高層領導人關切的主要議題。

中共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經歷 1989 年期間經濟抵制的同時，一度面臨共產主義核心價值崩潰，甚至威脅政權。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逐步進展經濟建設，並使其外交的政策更具彈性，避免為霸權及強權主義所左右，積極的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並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之下建立新的國際秩序，藉以擴大國家利益與提升國際間的利益。

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企圖心，展開與各大國間的交往，以提升國際形象與影響力，成為中共大國外交的開端。雖然礙於現實的力量及國際關係的影響，多極體的國際體系仍未成形。中共要藉此增強國家利益有一定的阻礙，但是，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政經互動的各項會議與場合，中共代表不斷強調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¹²

在毛澤東時期，中共立基於共產主義，主要是理想的期盼，到了鄧小平時期進入改革開放，中共政策直見走向務實，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道德卻從未消失。江澤民在 1997 年 9 月第十五次召開中宣示：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這次重要的會議中，在沒有最高領導人的情形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首次決定重大的人事與政策，而鄧小平理論仍然是這次會議中最主要的指導思想。中共仍主要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為最高指導原則。也就是以和平為基礎卻不受他國影響與干擾的外交關係。因此和平共處五原則成為這個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並且強調避免外國對內政的干涉以影響政權

11 中國外交概覽，1988-1995。

12 李建松、丁軍、呂祖明主編，當代世界與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244-247。

關於這部分的中共外交，是以國家利益與黨政利益為優先，並且同時面臨 1989 年以後最具嚴峻的外交環境。若以金援以及出訪及締約的次數來看，中共的確與第三世界及前共黨國家交流頻繁，但是實質上的經貿往來，我們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等經貿大國，交易的數量及金額遠大於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往來。到了後鄧小平時期差距更為明顯。尤其在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闡述對外關係時，首次把與已開發國家的關係放在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前，成為優先重視的對象。

第二節 經濟上的運用

一、經濟利益對國家利益的相對需求

摩根索指出：只要世界上的政治還是由國家組成，那國際關係中最後實際的作為就只是國家利益而已。就中共而言，現實中的經濟利益將會是最主要的核心利益，牽動到政治利益與國家安全。各國的利益關係搭建起了世界各國經濟的關係，而在蘇聯瓦解後的世界局勢下，國際間各國開始了經濟上的競爭。各國為了長期的競爭利益，爭取國際體系中有利的地位，這都將會對影響國內的經濟利益。因此凡是經濟實力愈大，相對的在國際間的地位也會愈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經濟實力的增加常帶有政治實力的影響，通常必須交互運用才能在國際地位中，更顯得舉足輕重。

中共的想法認為經濟利益就是物質的獲得，所以經濟利益就是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¹³經濟利益將會對國家內部或是對外關係有著不同層面的影響，因此經濟利益就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馬克思主義促成了社會主義下的計畫經濟，預期國內可以達到自給自足。但是，經過中國大陸的試煉，以及蘇聯和東歐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行後，情況不如想像。因此中共會採行改革開放就是因為國內需求已經無法滿足，甚至將拖垮中共的政權，造成政權合法性及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因此，中共的改革開放就是因為受到經濟利益的影響，也因為經濟政策的改變，因此轉向國外經濟大國的交往，以獲得經援以及技術，提振萎靡甚久的經濟環境，使中國再度復甦。

以經濟利益推動安全利益，經濟發展才是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水準提升的保證，是政治穩定的大前提，並推動了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為保證國內社會安定的根本基礎，其次則是提升國家安全的基礎事業與軍事設施。中共的內政，過去是以軍事優先於經濟，例如在毛澤東時期的「不要褲子要核子」。但是，很多的例子舉出，當時中共必須在政治上與軍事上的自足，在外交政策由一邊倒到與美蘇互不結盟，就國際戰略三角的形式而言，當時屬於美蘇中皆屬於敵對的狀況下，唯有保持自己的力量強大，而能確保國家的主權與領土等自主權不受其他大國的牽制，因此，經濟利益的強調不如政治利益來的高，這時期的外交政策就如同第二章所述，國家利益在當時是著重在哪一方面，外交政

策就會有所調整，不僅是單方面與美國降低敵意或是與蘇聯提升外交關係。

再者，對於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而言，軍事實力的後盾就是經濟，維護國家安全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經濟實力與物質上的支持，所以當國家的經濟力量遭受到一個重大的挫折時，這對國家的軍事能力會造成極大的影響；經濟利益又必須在和平安全的環境下才能更迅速的發展，軍事能力的提升也會因經濟能力的增加而增加，所以這是屬於相互制約的一種能力，只有在國家安全的狀況下，才會有和平的經濟發展，也因而維護到國家的安全利益，更能維護到國家的經濟利益。

二、建構大國外交之後國際體系對經濟利益的運用

中共在外交政策對應於經濟利益的部分，多是屬於相對性利益的增長，才對外交政策的執行面上，採取些微的調整，雖然很多時候是口惠實不至的狀況，但是，中共總會運用很多種宣示、訪問、締約等方式來消弭各國對中共外交政策改變的疑慮，所以就以經濟利益上，中共不得不與世界上各大國有著很具體的經貿往來，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實面，但就各國對中共要求改善人權等議題時，就將和平共處五原則搬出來，以轉移政治層面上對經濟的影響。

當中共為取成為大國的身分時，這將會對他對外經濟層面有著不同面向的影響，第一是能取得相當的國際地位，至少可以運用政治的影響，強化自己對外經濟的發展，至少在貿易摩擦下、市場爭奪中可以得到具主導的地位，甚至可以運用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例如利用貸款、經濟援助、優惠貿易等手段來實現其特定的政治需求，也就是經濟利益影響到政治利益。

在 1989 年以來中共已經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大國對齊的經濟制裁感到非常苦惱，但是，中共逐步以政治與外交的方式來化解這些困境，就以國際戰略中的戰略三角中，原來是中共處於美蘇之間，等到蘇聯倒台，美國已成為世界的唯一「一超」，美國的戰略角色顛經轉化成一個唯一樞紐的情形，只因為沒有國家能與之匹敵，而且中共在此時，就戰略三角的角色而論，中共在安全問題、貿易問題、意識型態問題變成眾所

13 余起芬、田新建等編，**國際戰略論**，頁 131。

注目的焦點¹⁴。更加困擾的是天安門事件之後，世界各經濟大國將中共列為制裁的對象；中共只有藉著多極體國際體系的建構，來對於中共能有脫困的情形，至少在大國之林裏，中共可以享有與世界先進國家具有仲裁的地位，相對的運用與宣揚多極體系時，中共雖然就以現有的現實狀況，實不足成為超強大國，但是列入強國之林，卻是比較容易。中共認為當前國際社會在經濟國際化中，各國面臨經濟發展的新機遇與新挑戰之際，世界各主要的經濟大國無不重視經濟發展問題，並戮力制定國際經濟發展的策略，發展與各國的夥伴關係與戰略協作關係，就是為了增強經濟實力，佔領世界市場，以最大限度地獲取並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經濟發展已成為各國競相追逐的主要目標與取得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¹⁵

就這部分看來，中共修正了不與大國間的結盟的原則，為了經濟的活絡與各經濟大國交往，但是中共不斷的以這是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是以「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說明現在的狀況，自然的要反對目前的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必須主張建立新的國際體系以因應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除了化解對於中共國家利益的威脅，以至於內部更深層次的政治利益的破壞。¹⁶

中共在經濟利益的爭取上，一直是認為是國家在世界的政治影響力有關的，他們認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始終是憑藉本國較高的經濟水準和較強的經濟能力，利用經濟手段取得和維持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統治，甚至加以控制或顛覆不肯配合的國家。

在美蘇兩極國家的對峙中，戰略態勢的消長、對抗力量的變化，經濟的實力佔了極大的部分，因為蘇聯就是國內經濟持續的惡化，造成蘇聯的瓦解，自然美蘇的對峙就在經濟實力的內耗中見出勝負。也因為如此，中共以重新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減輕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入侵。認為廣大第三世界必須認識到只有在經濟上的自力更生，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間經濟合作，減少對大國的依賴，才能保持

¹⁴ Yu-Shan Wu,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 Crises and Sequences Approach,"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4(December 1992), pp.179-224.

¹⁵ 亓成章、向中順，**時代特徵與中國對外政策**(北京：時事出版社，1998年)，頁4-25。

¹⁶ 劉勝湘，「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為時尚早—與葉自成商榷」，《中國外交》，第10期(2000年)，頁21。

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

三、經濟上運用的機會

由於中共經濟成長必須需要外資及技術的支援，對外交政策上，會有優先和次要的考慮，¹⁷對於與世界各大國間的外交政策上，必須採取著很實質的外交關係，在對外的經貿流通金額，對已開發國家(含美國)的貿易額在 1979 年的 175.26 億到 2002 年增長到 3100.72 億美元，可知已開發國家的確是中共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

表一、中共與世界大國自 1979 年至 2002 年間貿易比例統計表

單位：億美元

年 度	外 貿 總 額	美 國		俄 羅 斯 (前 蘇 聯)		已 開 發 國 家 (含 美 國)		原 共 黨 國 家 (含 俄 羅 斯)		第 三 世 界 (不 含 台 港 澳)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1979	293.33	24.52	8.36	4.93	1.68	175.26	59.75	34.68	11.82	45.77	15.63
1980	378.22	48.13	12.73	4.92	1.30	225.20	59.54	38.69	10.23	62.59	16.53
1981	403.75	58.88	14.58	2.25	0.56	243.83	60.39	25.20	6.24	70.01	17.37
1982	392.97	53.36	13.58	2.76	0.70	221.32	56.30	27.97	7.10	75.78	19.30
1983	407.27	40.24	9.88	6.74	1.65	223.6	54.90	30.22	7.40	75.86	18.60
1984	497.72	59.63	11.98	11.83	2.38	29.29	56.10	36.55	7.30	79.17	15.90
1985	602.46	70.25	11.66	18.81	3.12	349.09	57.94	49.74	8.26	86.91	14.42
1986	600.97	59.94	9.97	2.64	0.44	326.48	54.33	67.17	11.18	88.37	14.79
1987	681.10	67.72	9.94	2.30	0.34	341.06	50.07	62.83	9.22	92.39	13.56
1988	804.90	82.62	10.26	29.02	3.61	382.78	47.56	73.95	9.19	106.14	13.18
1989	825.83	99.89	12.10	36.77	4.45	395.81	47.93	78.75	9.50	103.79	12.52
1990	1154.40	117.68	10.19	43.79	3.79	482.25	41.77	73.96	6.41	156.72	13.62
1991	1356.30	141.66	10.44	39.04	2.88	562.67	41.49	59.56	4.39	188.79	13.92
1992	1655.30	174.95	10.57	58.62	3.54	680.04	41.08	90.43	5.46	231.84	13.96
1993	1957.10	276.52	14.13	76.80	3.92	1022.10	52.22	126.24	6.45	333.19	16.94
1994	2367.30	354.32	14.97	50.77	2.14	1266.63	53.50	97.85	4.13	413.06	17.45

¹⁷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201。

1995	2808.50	408.30	14.54	54.63	1.95	1494.75	53.22	107.39	3.82	622.50	22.16
1996	2899.00	428.41	14.78	68.46	2.36	1545.26	53.30	119.76	4.13	629.90	21.73
1997	3250.60	489.93	15.07	61.19	1.88	1651.26	50.80	118.40	3.64	737.94	22.70
1998	3239.20	549.37	16.96	54.81	1.69	1738.08	53.67	109.08	3.37	693.53	21.41
1999	3606.49	614.26	17.03	57.20	1.59	1976.98	54.82	118.29	3.28	789.87	24.30
2000	4743.08	744.67	15.70	80.03	1.69	2465.25	51.98	173.67	3.66	1187.39	25.03
2001	5079.68	804.85	15.79	106.71	2.10	2659.79	52.18	214.40	4.21	1240.41	24.33
2002	6207.68	971.81	15.65	119.27	1.92	3100.72	49.95	262.24	4.22	1546.08	24.91

資料來源：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台北：生智文化事業，2004年6月）。

在鄧小平時期，中共與已開發國家維持更多的互動和互賴，似乎與原來十個外交原則上有著極大的出入；1997年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中江澤民沿用鄧小平的對外政策，緊緊握著「建立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將「鄧小平理論」提升至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同等的權威地位，這個部分在核心領導轉變為集體領導中的中共是一個很穩當的作法，尤其是江澤民比毛澤東、鄧小平更缺乏歷史地位與魅力，造成他必須更謹慎小心的執行鄧小平以來的政策，並且要在經濟成就有明顯的提升前必須為之¹⁸，這都是江澤民對於外交政策轉變後有非常大的期待。因為這將是中國大陸長期處於經濟落後的狀況下，需優先推動社會生產力所必須的政策之一。

中共除了認為經濟決定國家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增強才能根本上維護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才能防止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敵對勢力的壓力和破壞，¹⁹所以中共在朝向21世紀的外交政策，主要為服務於國內的經濟建設目標，爭取有利於改革和發展的外部目標。從大陸社會內部變化情勢來看，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後，即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深刻的改造，力求建立更能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新政治、經濟體制，所以穩定壓倒一切的考慮下，中共的外交必須為維護內部的穩定而努力。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

¹⁸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雜誌》，1997年第18期，頁2-23。

¹⁹ 「江澤民促外交工作創新局：力爭我國在下世紀國際競爭中處更主動有利地位」，《大公報》，1998年8月

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

四、外交服務內政經濟問題的方式

為了解決社會貧富差距、西部人口大量外流至東南沿海省份、下崗職工等社會問題，中共不得不再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主軸，1992年14大時提出實施市場經濟，力求經濟體制與國際相符，1997年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一方面強調中共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持續加強內部改革，另一方面則注意向西方學習「法治」經驗，藉以拓寬對外開放領域和尺度。²⁰

但由於大陸社會內部存在著貧富不均、下崗工人再就業、國企改革困難、西部盲流向東部發達地區等內部問題，在本階段主流意識型態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引下，於是推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共總理朱鎔基在第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中說明：『西部大開發戰略對於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和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邊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²¹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也指出，西部大開發計畫不僅對推進全國改革和建設、保持檔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同時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會意義。

這也說明中共在這個時期很明顯的揚棄了以政治掛帥的思維，完全希冀以經濟救政治，借外國的資金救大陸內陸人民的經濟；解決很多的社會問題。因此，在如此寄以厚望的政策，如果不能一如預期的達到效果，中共內部原來對計畫經濟奉若神明的教義派人民或黨員，就會質疑到運用大國外交，得到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援助下，反而會動搖到廣大百姓對社會主義的支持，甚至有著動搖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問題會接踵而至。²²

但是，這是無法避免的一個內政作為，中共認為，沿海經濟開放發展之後，所得到的豐厚成果，讓西部大開發的過程，同樣需要國外經濟貿易的加入和推動，因此必須加

29日，版A10。

²⁰ 高振營，「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及其影響」，《外交學院學報》，第3期(1991年)，頁69-70。

²¹ 人民日報，1989年8月23日，版6。

²² 劉山等主編，中國外交新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頁85。

大招商引進外資，藉由積極爭取外援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彌補貧困地區資金不足現象；同時也要做好有關對外宣傳工作，使援助合作能為中西部地區的扶貧工作開啟作用。²³因此，西部大開發是鄧小平為了在其任內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也是因應大陸社會內部問題與需求而必須實施的政策，當國內的資金及技術均沒有辦法再分身於這項重大工作時，與西方等資本主義大國尋求援助是不得不為的工作，外交上的政策必須為此一內政服務，也可以明確的表露出來。

在中共提出西部大開發計畫後，先後於 2000 年 4 月及 10 月召開「西部開發論壇」，吸引了許多資本雄厚的企業，五萬多名商人與會，希望能藉由此一重大的建設計畫中，取得相當大的利益，而且有許多的跨國公司參與其中，幾乎是所有經濟大國都參與其中。而且中共與美國聯合經濟委員會在召開 13 屆會議時，即向美國闡述西部開發計畫，期盼能得到美國企業的支持與投資，中共前總理朱鎔基同一時間在日本訪問時表示，不應以歷史認知來刺激日本，並強調西部開發計畫可以帶給日本經濟界一個巨大的商機；對俄羅斯總理卡西亞諾夫會談時，朱鎔基也不忘的表示，西部開發計畫可為雙方的經濟科技等領域提供合作提供契機，卡西亞諾夫也回應稱俄方非常關切大陸的發展計畫，特別是對於西部開發戰略。

可知中共不斷的利用出訪或是各式的世界型集會中，強調與推銷其西部大開發，而且推銷的國家中，並不是僅以前蘇聯為主，甚至是中國大陸以歷史認知有極大仇恨的日本、視為資本主義及霸權主義於一身的美國。

這個方面看來，中共的確是為了經濟發展而暫不提及馬列毛主義的意識型態，甚至是就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去拉攏各經濟大國，完全以現實主義的眼光去執行有關於與資本主義相似的事情。卻也在另一方面強調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論調，²⁴所以才會有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等相關的意識型態理論²⁵。

這無非是共產黨意識型態，眼前所追求的是改善國內的經濟，而不是要全盤的推翻社會主義國家的立國基礎理論，或是讓人民質疑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23 裴監章，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經濟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24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第 4 期(2001 年)，頁 6。

雖然，經濟上的部分已經與中共意識型態原則有極大的不同，這在許多的中共學者也有不看好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大國外交」，這將對國內以基本教義及原有在計畫經濟下的既得利益者，勢必造成極大的衝擊，並且對這一外交政策質疑與反對，致使中共受到與世界各大國結交後，反而成為一種「和平演變」，這是中共在實行上非常具有威脅的內部矛盾。

²⁵ 人民日報，1999年5月14日，版1。

第三節 外交上的運用

一、經濟利益是中共捨意識型態的權宜之計

中共於 1978 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指示是以經濟利益開始為出發點²⁶，那麼大國外交必須是以能支援中共，對中共能與資助的國家才會提出相當的結交。

雖然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當中，對中共的外交政策原則已經有許多的限制，尤其是絕不結盟，這對於不結盟狀況，中共則是以夥伴關係的方式，或是以特定原則性的結為夥伴關係，希冀為能以這單一性質的結交，如果是以經濟方面，就僅止於經濟的部分，而絕不會與政治上有所接觸，尤其是對於內政上。因此，中共在與各國在針對經濟上的議題上與世界各國交往中，絕不談論也不會希望談論到以「人權」以及可能對中共主權問題的議題，這就是中共希望交往的原則。²⁷

表二、1979-1999 年以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出國訪問統計表

		美國		俄羅斯 (前蘇聯)		已開發國家 (含美國)		共黨國家 (含原共黨國家)		第三世界 國家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979	27	2	7.4	0	0	14	51.9	4	14.9	9	33.3
1980	47	2	4.3	0	0	16	34.0	5	10.6	26	55.3
1981	38	2	5.3	0	0	13	34.2	2	5.3	23	60.5
1982	32	0	0	1	3.1	8	25.0	5	15.6	19	59.4
1983	52	2	3.8	0	0	19	36.5	5	9.6	28	53.9
1984	74	2	2.7	1	1.4	22	29.7	17	23.0	35	47.3
1985	95	3	3.1	2	2.1	24	25.2	22	23.2	49	51.6
1986	76	1	1.3	0	0	28	36.9	15	19.7	33	43.4
1987	55	2	3.6	1	1.8	19	34.6	12	21.8	24	43.6
1988	45	2	4.4	1	2.2	17	37.8	11	24.4	17	37.8
1989	52	1	1.92	1	1.92	8	15.4	9	17.3	35	67.3
1990	53	1	1.9	2	3.8	3	5.7	5	9.4	45	84.9
1991	66	0	0	1	1.5	20	30.3	13	19.7	33	50
1992	92	1	1.1	1	1.1	36	39.1	12	13.0	44	47.9
1993	80	1	1.3	1	1.3	17	21.2	16	20.0	47	58.8
1994	89	3	3.4	1	1.1	31	34.8	14	15.7	44	49.5
1995	115	1	0.9	1	0.9	30	26.1	24	20.9	61	53.0
1996	138	2	1.4	4	2.9	30	21.7	29	21.0	79	57.2
1997	108	2	1.9	3	2.8	22	20.4	22	20.4	64	59.3
1998	85	2	2.4	4	4.7	24	28.2	17	20.0	44	51.8
1999	84	1	1.2	2	2.4	20	23.8	17	20.2	47	56.0

資料來源：「後鄧小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

²⁶ 鄂煥成，「走向成熟的中國外交」，《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第 4 期(1992 年)，頁 20。「持同樣的看法，並指出拋棄了兩極格局下，以意識型態劃線的作法，公開把國家利益作為外交的首要原則，最終走出了冷戰的陰影。」

²⁷ 寧騷，「選擇夥伴關係、營造夥伴關係-跨入 21 世紀的中國外交」，《新視野》，第 2 期(2000 年)，頁 5。

美國在與中共在外交上的接觸，不斷針對「人權」、「軍備」、「兩岸問題」等視為干涉中共內政的問題時，中共常是以和平共處五原則的理由來反質疑美國的作法：就是中共不會去干涉他國的內政，也不希望他國去干涉本國的內政。世界上各民主國家在與中共結交多是以經濟為目的，因此這種具有道德上的議題，是常常被國際間各民主大國所必須迴避談論的。

所以，中共在執行其大國外交政策上，其實是在堅持其固有的原則，來圓滑的執行外交，²⁸因此，中共到目前為止，仍是以這種方式去執行，只是中共內部並不是與江澤民有同樣的想法，除了質疑這個方法是不是會造成中共政權合法性的消逝，是否也會因此招架不了與這些以民主及資本主義思想為主的經濟大國交往後，對大陸國內民眾經過與民主國家的互動後，會對揚棄社會主義的制度與共產黨專制的信念。

二、與美國的外交運用

中共在以歷史以及現實的眼光中，認為美國是一個造成會以武力干涉他國內政的強權國家，也是造成兩岸統一的外國勢力²⁹。而且美國基於後冷戰時期，戰略目標的改變，至少就中共的眼光是的確具有深深的敵意；不僅是中共對台的飛彈數量，其實就許多的現況可見，以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在 2005 年 6 月 4 日在新加坡的亞太安全會議中以「反恐之外的美國和亞太安全」為題演說中提出：「有人關切中共擴軍將為此地區微妙的軍事平衡帶來風險，尤其是台灣，但不只是台灣。」³⁰。以此的眼光看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其實對中共多少是抱持著可能的威脅。

因此中共想對這些國家展開大國外交，事實上，大陸部分學者是不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例如美國華府中國論壇社社長陳有為就認為自 911 事件之後，美國已經對於反恐已經是以先發制人的方式，不顧聯合國的反對，甚至對北約國家以二分法來劃分支持美國

²⁸ 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頁 200-206。

²⁹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中國台灣問題*（北京：九州圖書出版社，1998年），頁 44-50。

³⁰ *聯合報*，2005年6月5日，版 2。

就是支持反恐、不支持美國就是不支持反恐，在這種狀況下，中共原本認為應走向多極的國際體系，幾乎是圍繞著美國在轉，中共基於和平共處五原則的方針之下，既不贊成美國出兵伊拉克，也不開放新疆基地做為美國的前進基地之一，這樣一來中共所希冀的大國外交，的確是一嚴重的考驗，甚至是一個破局的大國外交。所以，中共在對美國的交流中，是以另外的角度與方式來執行其外交政策，不是與美國建交，而是以單項交流與美國建交，才能確保其國家利益，維持這個外交政策的執行。

但是，也有不同看法的大陸學者在以國家利益與基於世界各國無可避免的合縱連橫態勢中，歸結出五項要點：

- 1.美國在處理軍控等許多重大國際問題時離不開中國理解與和支持。
- 2.美國離不開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
- 3.美國在對付全球挑戰和保持亞太地區安全方面視中國為可以借重的一支重要力量。
- 4.美國在解決全球問題時（如恐怖、販毒、環保等）需要中國的配合與協作。
- 5.美國在自我發展中需要以中國吸取某些先進的科技文化知識和廉價的優秀人才。³¹

所以，中共在部分與自己的主權或是國家利益未受到影響的狀況下，對美國所希望通過的方案時，中共多不希望由美國全般掌控與主導，這會導致中共難以「平衡者」的角色從中獲利。³²就以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中共與美國都互相認為對方是挑戰自己意識型態的敵對國，而且這個事件造成了中共與美國在政治、經濟、戰略的互動有所停滯，二年後在 1991 年底當時美國國務卿貝克到訪北京，強烈的指責北京當局對人權問題的漠視，突顯中共與美國存在已久的衝突與矛盾；但是，中共還是堅守著鄧小平 90 年代於冷戰結束及蘇聯倒台之後，對中共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增加信任、減少麻煩、增加合作、不搞對抗」，³³這與韜光養晦的指導是如出一轍的理論原則，也不會因貝克在北京訪問期間的大放厥詞而有所抵制，也儘量保持低姿態避免和美國發生公開衝突。

畢竟這種方式是有效的，中共就是把美國視為先進技術、資本和市場的主要來源，

31 高恆主編，**大國戰略**，頁 248。

32 周煦，「『十四大』後中共的外交政策：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頁 58。

33 「中美之間失去最後的互信」，《亞洲週刊》，1995 年 6 月 18 日，版 7。

並深信以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必能吸引以資本主義起家的西方國家，把道德理論放置一旁，優先以經濟利益放在第一，進而對中共釋以不損及其國家利益的好處。1994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對美國國內經濟的幫助，將人權問題與對延長對中國大陸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分別討論，這樣對中共是一大利基，也是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往後廣大的市場利益做出的交換條件。

善用大國本身的利益基礎與地位，是中共對於美國交往的一個極大工具，但也有例外的時候，鄧小平曾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的主要障礙，甚至可能發展成兩國關係中爆炸性的問題」，³⁴而美國總統柯林頓允許李登輝在1995年6月到美國作「私人訪問」並在其母校康乃爾大學公開發表演說『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個原因是由於美國參、眾兩院對柯林頓施以巨大的壓力下所產生的決定；事實上，中共對美國這次決定的作法也以對台灣島周邊海域實施一系列的導彈試射及軍事演習，美國也對此做出一個由獨立號及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組成的戰鬥群，前往靠近台灣的水域。³⁵

當中共一旦是認為美國是侵犯到他的政權利益或是主權問題，中共則對於夥伴或是協作等關係置之一旁，必須要以維護主權而反對並且採取激烈手段，³⁶這是與獨立自主的和平政策是有相違背的地方，事實上這也是中共對美國交往當中是比較麻煩的工作。

三、對俄羅斯的外交運用

俄羅斯與中共在蘇聯未瓦解前的交往，除了因為路線之爭與毛澤東轉化到鄧小平期間，是有若干的不同，主要是以政治方式的逐漸不同、對外蒙、東北及新疆等與前蘇聯交界的領土衝突問題，不過基於歷史上的結交程度，還是持續著「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些部分已經對於其雙邊關係、國際事務的協調、共同推動世界局勢的穩定與新國際體

³⁴ John Copper, "U.S.-Taiwan-China Relations,"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 1999, p.486.

³⁵ Dana Priest & Judith Havemann 「第二支航空母艦艦隊駛往台灣」，華盛頓郵報，1996年3月11日，版1。

³⁶ 「江澤民促外交工作創新局：力爭我國在下世紀國際競爭中處更主動有利地位」，大公報，1998年8月29日，版A10。「江澤民即曾指出，『要堅決維護我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努力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在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堅持目標，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鬥爭』」

系的建立有著很明確的互利行為。³⁷只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冷戰的結束，造成新的俄羅斯為求經濟的奧援，外交策略主在調整與美國、歐盟間的關係³⁸，甚至對美國的政策言聽計從，這是讓中共感到挫折的事情。

相對應到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容易受到質疑，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受到了空前的打擊，這樣由前蘇聯及東歐國家的「精神污染」，中共擔憂的程度並不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神價值入侵來的小。³⁹不過，因蘇聯倒台之後 1992 年蘇聯軍隊撤出中國大陸西北及東北邊界，北京只要擔心的是新的民主的蒙古共和國在意識型態上對大陸的影響，而不是軍事安全上的影響。這時期也因為蘇聯威脅性的降低，中共與蘇聯的幾次高層的會晤，有著各種新的雙邊關係產生，例如 1992 年葉爾欽訪問中國大陸之後，通過了 24 項共同聲明、文件以及合作備忘錄，由這些交流後，中國大陸獲得了改進軍事設備，加速軍隊現代化，俄羅斯也將可能獲得大量的食品等民生物資。⁴⁰

因此，中共對於俄羅斯的交往，建立在經貿的交流上遠不如軍事上的獲得上，俄軍裁減就是共軍準備接收，中共尤其體認到波灣戰爭中，高科技軍事的力量，遠比傳統武力數量龐大的實力來的驚人；無論中共再怎麼對外宣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但是，俄羅斯強大先進的軍事科技在經濟蕭條中逐漸的擱置，中共豈不能取之而後快，且中共此時的民生工業逐步的發展，也必須有一個海外的市場，自然對於以物易物的經貿交易，能涉及軍事工業的轉移或是軍備的更新，中共更是歡迎之至，包括米格二九飛機、裝甲車輛、潛艦、高科技軍事裝備等，全都是中共願意購買的。因此，中共在取得俄羅斯這樣軍事大國的軍事利益上，不能不說是違背了中共儘量與第三世界小國實質交往的初衷。

37 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頁 57。「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俄正式建交，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月中旬，俄羅斯總統(Boris Yeltsin)葉爾欽首次亞洲之行即選擇訪問中共，雙方簽署二十四項文件，確定兩國相互視為友好國家；一九九四年九月初，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俄，簽訂『中俄聯合宣言』、『中俄西部邊界協定』、『不把戰略導彈瞄準對方聯合聲明』，一九九六年底，葉爾欽再度訪問中共，雙方簽署『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宣言』；一九九七年四月江澤民再度訪俄羅斯，雙方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聯合聲明等」

38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戰略大格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年)，頁 81、83。

39 阿利森·貝勒斯，「關於中國和東歐之見關係的變化情況」，**中國與東歐**，1990 年。

40 趙全勝，**解讀中國外交政策**，頁 315。

第四節 本章結論

中共對於當前國際局勢對於「一超多強」乃至「多極社會」趨勢及看法，雖然與現實狀況並無太大的差距，他的重點幾乎都是放在主權獨立、集體安全、追求平等發展的機會、建立新的安全觀等等，卻也運用了些外交手段，迴避了對中共不利的議題，這其中包括了主權問題、人權問題、民主問題以及仿冒等問題。當中共將外交視為發展國家的利器之一時，工具性的概念使得務實的外交特質，就逐一展現，大國外交的具體行動也就此展開，雖然中共對於外交的精神方向是倒向第三世界國家，藉以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龍頭自居，卻又將以此地位來對世界各大國展開一連串的交涉與交流，期能獲得更多的資源以及地位，這不是一種外交的原則，卻是一種運用，不但對中共而言這是一種戰略上的運用，近期而言這也是一種戰術上的運用。

從中共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共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已經超過二十年，其綜合國力的提升，也助長了中共對於自己地位的認同，從歷史的大國、地理上的大國的原始認知上，應扮演出一個具影響力的大國，無論是在軍事、經濟乃至政治上，必須逐步的邁進，因此，自我期許以及轉化所交往的對象是在所難免的趨勢。但是，外交原則是屬於一個國家內政以及國策的延伸，所以，中共必須要有非常大的利基才能將意識型態的國策，轉化成務實的執行面，無論是對第三世界各小國，或是以競爭又合作的態度與各大國展開交往，都是有一定的必要因素所支持著，只是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中共的目標就是全力追求一個穩定的國際、國內政治、社會環境，全力的追求經濟的發展，對外界發展現象的解釋也是以此目標的有利與否為依歸。其對中共的利弊則主要是依循在主觀的認定與客觀的條件，中共期待與大國交往的模式，或是自認的地位是否為國際社會所認同，將是其所希望的目標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就以上的行為而論，中共的舉措容易在國際間得到一種兩面討好以及只享福利未盡義務的形象。